

中国广播电视史初论

艾红红 著

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今天全部

中央人民政府

山东
大学
出版
社



中国广播电视史初论

艾红红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广播电视史初论/艾红红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607-2513-9

I. 中… II. 艾… III. ①广播事业-文化史-研究-中国②电视事业-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G22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5778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安丘一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9.125 印张 234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1000 册

定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 录

事业史篇

非连续性发展与非“大众化”传播	
——中国广播电视历史论之一	(3)
指令性发展与政治化传播	
——中国广播电视历史论之二	(12)
产业化探索与信息化传播	
——中国广播电视历史论之三	(2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动因探析	(39)

新闻传播史篇

改革开放前我国电视新闻传播的回顾	(57)
走出“左”倾政治阴影，扩大新闻信息来源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进程之一	(66)
拓宽报道领域，改进传播方式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进程之二	(79)
突显电视特色，调整传播结构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进程之三	(9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新闻结构转型的历史省察	(11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新闻的内容结构转型	(12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新闻的形式结构变迁	(146)

科技传播史篇

我国电视中科技传播回顾	(161)
新中国广播电视科技传播简史 (1949~1999 年)	(171)
附：新中国广播电视科技传播大事记	(206)

理论视野篇

网络时代的新视野

——广播电视史学研究三论	(227)
追踪时代步伐，反映广电事业新貌 ——访《广播电视辞典》主编赵玉明教授	(237)
我国电视新闻深化改革走向探析	(245)
试论我党新闻事业的“喉舌”传统与当代转型	(256)
准确、完整地理解和传播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 ——兼与《邓小平论新闻宣传》编者商榷	(268)
试论勒纳的传播与发展理论	(275)
后 记	(284)

事业史篇

非连续性发展与非“大众化”传播^①

——中国广播电视历史论之一

世界最早的正式广播电台诞生于1920年。1923年，广播便传入了中国。从时间上看，中国广播事业的起步还是比较及时、比较早的；但是，从1923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正是国内战火连年、社会动荡不安的一段历史。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广播事业的发展应当说是较为迟缓、滞后的。

一、动荡社会中的非连续性发展

在旧中国，与当时的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直接相关，广播事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非连续性。这一点，从其历史进程中便不难看出。

这一时期，广播事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23~1927年的北洋政府时期，为广播事业的起始阶段。1923年，美国商人奥斯邦运入中国一套无线电广播设备，在上海私自创设了“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简称“奥斯邦电台”），开中国境内无线电广播事业之先河。此后，又相继有外商在上海等地设立了几家小功率的无线广播电台。

我们知道，广播的出现，最初纯粹是由于技术上的推动，但在这一技术逐步成熟后，广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信息传播速度

^① 本文及以下三篇系国家广电总局项目“中国广播电视新论”中由本人承担的“历史论”部分。

快、受众范围广等优势便很快被人们所认知，于是或受商业利益所驱动，或出于政治宣传等需要，各种类型的广播电台陆续创办起来。从我国当时的情况看，外商来中国创办电台的最初目的，大都是为了推销本公司经营的无线电器材，显然，这一动机属于前者。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一项重要成果，广播传入中国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若把这一事件放在大的世界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它却又是西方帝国主义入侵的产物。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吞下，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相伴随，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观念等也陆续被引入中国。广播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北洋政府虽明令规定，不许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私设电台，但由于政府的孱弱无能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虽经官方多次交涉，外商电台却依然我行我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落后便要遭人欺凌的道理。

真正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电台，直到1926年10月才在哈尔滨出现，这就是在奉系当局支持下由东北无线电专家刘瀚主持设立的哈尔滨无线广播电台。这也是我国领土上出现的第一座官办广播电台。此后，在中国早期的地方广播管理机构——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积极筹备下，又先后在天津、北京、沈阳三地设立了几所官办广播电台。1927年3月，上海新新公司广播电台成立，为中国民营广播之滥觞。

迄今了解到，至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前，中国境内先后共出现了十几座广播电台。其中既有官办的，也有民营的；既有中国人筹建的，也有外商设立的。这些电台的发射功率一般都比较小，节目覆盖范围也仅限于广播电台所在地及其附近地区；还没有一座全国性的广播电台。

第二阶段是1927~1937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广播事业的初步发展阶段。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

党右翼势力控制了国内政局，在南京建立起“统一”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视广播电台为“党国喉舌”，将其作为推行内政外交的重要宣传工具，不仅致力于建设覆盖全国的党营广播事业网，还积极制定政策，推动和规范民营广播事业的发展。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公布了《中华民国无线电台管理条例》；8月，南京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12月，政府又公布《中华民国无线电台条例》，明确规定广播电台得由“人民设立”，允许民间资本涉足广播事业。30年代初，一大批民营电台在上海等地兴起，广播事业一度得到比较快速的发展。据统计资料显示，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共有各类官办、民营广播电台78座，总发射功率120多千瓦，全国收音机20万台^①。1936年，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还制定出一套详尽的管理与发展广播事业计划，意在大力扩张党营广播的基础上，规范民营广播电台的发展；同时，国家资源委员会也草拟了一份预计投资为2.7亿元的五年工业计划，打算在内地筹建一批以生产收音机和电子设备等为主要产品的工业区^②，推动民族电子工业的发展。但未等付诸实施，抗日战争即告爆发，这一计划也就此搁浅。

第三阶段是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播事业的多元并存阶段。抗战爆发后，与纷乱的时局相对应，中国国土上出现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政权，即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政权和日伪政权。在不同的政权控制区内，又分化出五种不同类型的广播事业：“即大后方的国民党广播事业、沦陷区的日伪法西斯广播事

① 参见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卷），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② 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业、沦陷区的民营广播事业、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广播事业以及苏联广播电台和美军广播电台。”^①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战爆发不久，中央台即停止了在南京的播音，随后由汉口广播电台、汉口短波广播电台和长沙广播电台联合接替了中央台的播音。直至1938年3月，中央台才在重庆重新恢复播音。以“非常时期”为理由，国民党当局对民营电台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甚至禁止开设民营电台。一时间，国民党党营广播垄断了大后方的广大地区。在沦陷区，日伪政权一方面控制了原有的通信与广播设备，另一方面还大肆开办电台，并强迫中国人使用由他们提供的廉价收音机，接受他们的奴化宣传。

此外，抗战爆发后，为加强日寇占领下的上海的宣传工作，苏联政府于1941年在上海设立了苏联广播电台。抗战后期，美国军队也进入中国，参加对日作战，在广西、云南、四川等地设立了美军广播电台。这些美军电台一般电力较小，主要面向美军官兵，播出了一些有关军纪、军中娱乐等专门节目。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1940年12月30日，在革命圣地延安的一座土窑洞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广播电台诞生了。尽管由于条件艰苦，设备简陋，因而节目内容尚显粗浅，形式不免单一，规模和影响也相当有限，但它发出的却是中国人民正义的呐喊和不屈的怒吼。

第四阶段是1945~1949年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广播事业的二元对峙、彼伏此起阶段。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接收了原日伪沦陷区的绝大多数广播电台，并在此基础上大力扩张其党营广播事业网，一度超过了战前规模。但以1946年国共交战为分水岭，国民党的党营广播事业又逐步走向衰落。随着人民解放

^① 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卷），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军由自卫到反攻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广播事业不久即土崩瓦解。在国统区，民营电台曾一度有所复苏，电台数量增长较快，但由于受到当局的多方钳制，因而社会影响也很有限。

与之相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广播事业的力量却日益壮大。1947年3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陕北新华台迁入北平，随即更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实质已担负起了全国性中央台的任务。随着许多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利用接管的原国民党广播设备，一批人民广播电台也陆续兴建起来。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各地已成立人民广播电台近40座。

通过上述历史省察可以看到，无论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后继的国民党政府、日伪政权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政权，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自己的广播事业，但从全局来看，这一时期，整个中国广播事业始终处于一种无序的分割发展状态。当然，在那风云动荡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或组织来对广播事业进行通盘设计和长远规划的；至于持久运营的广播电台，也就更不现实了。这样的结果，客观上便导致了连续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广播事业体系始终没有在旧中国出现。正是因此，旧中国的广播事业虽然艰难跋涉了二十几年，却并没能走出多“远”。

二、缺乏受众的非“大众”化传播

如果说广播电台的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属于广播事业的硬件建设的话，那么，广播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即传播的信息、内涵则应属于广播事业的软件建设。旧中国广播事业除日伪电台外，集结了一批科技、文化界精英，传播了许多有益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等方面的信息，为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旧中国广播事业多种所有制并存，创办电台的目的不同，各电台广播在内容与价值取向上自然也就存在较大的差异。以国民党中央台为代表的政府官方电台，出于政治宣教、文化传播等服务于政党统治的目的，偏重于播出一些相对严肃的内容。在南京中央电台正式开播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曾刊登通告宣称：“嗣后所有中央一切重要决议、宣传大纲以及通令、通告等，统由本电台传播。”^①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中央电台的播音，主要包括了宣传、演讲、教育、新闻和娱乐等五大类。抗战初期，国民党广播电台以及绝大多数爱国的民营台，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政治宣传洪流中；但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电台中却又不时充斥着诸如“曲线救国”、“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等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论调。同时，出于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国民党电台甚至屡屡造谣，传播了许多变形、夸张以至无中生有的虚假信息，从而使听众逐渐对其失去了信任。

而就外商广播和民营商业广播来看，为了销售更多的无线电设备，或赚取更多的广告份额，多数创办者和经营者都非常注重对广播内容与节目形式的设计，注意安排一些贴近市民趣味、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娱乐类、新闻类及市场行情类节目，以吸引受众收听。这样一种尊重受众、吸引受众的传播理念，固然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但其出于商业动机而一味迎合受众、降低受众，有时甚至完全脱离现实政治、忽视社会道德建设的做法，却又不免为时人所诟病。众所周知，为了吸引听众，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民营电台曾一度靡靡之音泛滥，表现出明显的庸俗化、市井化取向，以至被当时的有识之士斥之为“宣传肉麻文学”的

^① 1928年8月1日南京《中央日报》，转引自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卷），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播音^①。

与上述电台完全不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广播事业从开播第一天起，就把“党的喉舌”与“人民喉舌”的完美统一作为其最高追求：延安台创办后，不仅及时、准确地宣传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且注意紧密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把为群众服务、当好人民“喉舌”作为电台工作的基本方针。1946年元旦，延安台曾播出一篇《自我介绍》的稿件，指出该台的宗旨是“使得各位了解人民政党、人民军队和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解放区的情形，了解它的主张和事业”；人民广播事业既然是“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那么就应该大家来管理它，利用它，掌握它”，“人民大众的号角要由人民大众来鼓吹”^②。在其播出的另一篇文章《大家办广播》中，又强调指出，延安台将“歌颂人民的业绩、英勇、智慧、机警与才能”^③。它将驳斥反人民的造谣、污蔑以及无耻谩骂，希望大家“充分地享受它……充分地利用它”；“你有意见，你有主张，你要代表人民讲话，那么你就写成稿件，至少是供给材料，由XNCR代你转播吧。但是大家听，这还不够，还必须大家讲。大家的耳朵加上大家的嘴巴，才能算是两全其美！”“XNCR是我们的，是中国人民的，要全力经营，要大家办。”^④同年，延安台还曾向社会发布公开信，广泛征求各地群众意见，并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积极改进和丰富节目样式。

① 转引自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卷），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② 杨兆麟、赵玉明：《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③ 杨兆麟、赵玉明：《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④ 杨兆麟、赵玉明：《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这些措施的实行，都有效地提高了延安台的工作质量，扩大了延安台的社会影响，从而赢得了广大听众的信任。许多国统区和沦陷区听众都曾冒着生命危险收听延安台广播，并称它为“黑夜中的指路明灯”，“精神上的安慰和希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旧中国的广播事业，尤其是我党早期的广播实践，在许多方面都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无论从广播电台分布、受众媒介拥有情况看，还是从广播传播的影响范围考察，旧中国的广播都还不能算作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媒体。

我们认为，“大众化”媒体与大众媒体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以媒体自身所具有的传播属性来判断的，而前者则应以媒介信息的传播范围即受众数量和比例来衡量。如前所述，作为20世纪出现的先进大众媒体，广播事业引入中国还是比较及时的，但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形形色色的电台虽办了不少，有的功率还相当强大，但广播收音机却始终没能成为普及中国民众的大众化媒体。这是因为，对广播媒体而言，技术问题的解决只是为其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社会需求与相应的经济支撑才是推动这一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因。由于经济和技术条件的落后，在当时的中国，广播收音机一直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普及到一般大众。这也同时意味着，广播的声音并没有真正传向大众。

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时期过渡的广播事业，由于其超越时空、机动性强、信息传递及时等优势，一经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出现，即顺应了时代需求，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而收音机在原产地国家低廉的价位，也为广大平民购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广播出现不久即得到广泛普及。无论是在艰难困顿的经济危机年代，还是凄风苦雨的二次大战时期，广播收音机都一直是英、美、法等国家平民家庭与外界联系的便捷媒介，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亲密伴侣，更成为各国政要发表时政演说、振奋国民精

神的重要舞台。在美国，到 20 世纪 40 年代，家庭收音机的普及率就已超过了 80%。

中国却不同。起步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广播事业，由于“先天不足”——从一开始，它就打上了深深的经济和文化侵略的烙印，因而政府对这一外来的新兴事物是被迫接受、而非主动迎取的；后天又严重“营养不良”——广播虽被引入中国，但相应的技术却没有在当时这片科技贫瘠的土地上找到适合生长的土壤，广播的一应设备，包括从发射机到接收机等主要元件国内均不能独立研制和生产，均需依赖进口，这无形中大大提高了收音机的成本。对于经济落后的旧中国来说，欲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广播的发展与普及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虽然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甚至是日伪政权都非常重视广播的宣教作用，注意发展和扩张自己的广播体系，但直至解放前夕，全国收音机的拥有量却只有约 100 万架（其中还包括日伪统治时期在沦陷区强行推广的几十万架廉价收音机）。若按当时全国人口为 4 亿计算，平均每 400 人才拥有不到一架收音机；而且，这些收音机又大多集中在东北、上海和其他几个大中城市，农村则基本上没有收听工具。那时，广播收音机是上等人家昂贵的摆设，对于收入微薄的绝大多数国民，尤其是温饱问题尚没有解决的广大农民而言，要想拥有这等高档消费品，无异于水中望月，遥不可及。

旧中国广播电台主要分布于城市，收音机拥有者主要在上流社会的特点，也就决定了广播传播排斥了一个最庞大的受众群体——广大的城乡工人和农民阶级，尤其是农民群众。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绝大多数为农村人口。而主要分布于大、中型城市的广播电台和以城市受众为对象的广播传播，是不可能、也不会顾及到农民群体的信息需求的。旧中国广播事业发展中的这一偏失，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严重失衡的一种表征。

指令性发展与政治化传播

——中国广播电视历史论之二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一步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却还只能算是一种相对片面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第一，广播电视事业建设主要是适应党和政府的宣传需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指令性发展；第二，广播电视传播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以传者为中心的偏于政治化的倾向。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发展

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作为一项主要由政府投资兴办的公益事业，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硬件”建设主要是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下，根据有关部门的统一行政指令按计划发展的。

这一时期，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56年，可称作广播事业的结构调整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广播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即明文规定：“发展人民的广播事业”。为了更好地领导和管理全国广播事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总署下辖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于1949年成立。接着，从中央到各大行政区、省和直辖市都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广播事业管理机构。没收原国民党广播设备，改造私营电台，普及人民广播事